

改革與四項基本原則

中共宜昌市委宣傳部

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

主编 徐春浩 黄大钧

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

封面题字：张 健

责任编辑 刘开美 云 成

目 录

前言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	张忠民 (3)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罗清泉 (2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万久才 (37)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王道生 (53)
改革——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柏世友 (72)
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	
——浅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徐春浩 (8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之浅论	桑贤彬 (104)
必须坚持和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蒋光明 (110)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刘开美 (120)
谈认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曲折过程和战	
略意义	王法祖 (139)
两个基本点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唐建平 (155)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哲学思考	刘景利 (163)
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生产资料市场	喻可商 (174)
试论厂长负责制与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的领导	
——学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笔记	朱发辉 (18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形式的特点及应采取的对	
策	徐前波 (191)
改革的再认识和新思路	云 成 (197)
试论改善企业经营机制	刘烈文 (206)
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形式和特点	周光球 (212)

试论“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	陆三桃(22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要为改革、开放服 务·····	陶 熔(227)
在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能实行多党制···	袁新华(235)
坚持改革、向内使劲是搞活企业的基础 ——宜昌纺机厂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情况调 查·····	卢志鹏 谈雪桥(244)

前 言

遵照中宣部通知的要求，1987年，我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本书。市委领导同志为全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专题辅导。广大专业和业余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不少领导干部，围绕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10月22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委、市社联（筹）、市委党校、市委讲师团、市体改办、市经研室、中南橡胶厂、湖北钢球厂、市供电局等单位又联合召开了宜昌市“两个基本点”理论讨论会。《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论文集，就是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它包括市委领导同志辅导“两本书”学习的报告以及全市“两个基本点”理论讨论会评选出来的优秀论文和部分入选论文，共计22篇。这本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市各级干部在学习“两本书”，研究两个基本点关系问题上的成果。编辑这本论文集，旨在加深对改革的社会主义属性的理解，推动全市改革的深化；交流理论学习、研究的成果，推动全市理论学习、研究的深入。参加全市“两个基本点”理论讨论会论文评选和《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论文集编辑工作的有：徐春浩、黄大钧、邹以文、张子美、夏灵魁、刘家椿、胡兆明、王法祖、郭辅炼、龚中元、朱光华、刘开美、季光荣、刘景利、云成等同志。徐春浩、黄大钧同志任本论文集的主编，刘开美、云成同志任责任编辑。召开全市“两个基本点”理论讨论会和编辑出版《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论文集，受到中南橡胶厂、湖北钢球厂、市供电局、市包装印刷工业联合公司等单

位以及桑贤彬、朱发辉、杨顺良、吴培德、甄熙荣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市委顾问张健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1987年10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

中共宜昌市委书记 张忠民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治国之本，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立国”与“治国”是两篇大文章。从中国革命的历程来看，我们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到1949年10月1日，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做完了“立国”这篇大文章。当然，这篇文章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因为还有个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实现统一。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思，也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继续做好“立国”这篇文章。现在，港、澳问题已基本解决，台湾问题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目前我们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做好“治国”这篇大文章。实践证明，不管是立国还是治国，我们都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原则。早在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就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明确提出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并指出：“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明确提

出来。后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成为贯穿我们党的总章程和我们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成为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原则。

为什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原则呢？

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学习的体会和认识。

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思想战线的斗争，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大意义

大家知道，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纠正了多年以来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我们党坚决而有力地纠正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左”的错误和影响，如平反冤、假、错案等。当时，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尽管这种变革顺应时代的潮流，合乎党心、民心，但是党内外很多人对这种变革还缺乏思想准备和清醒的认识。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当时思想政治领域里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一部分同志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思想僵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在党内，在社会上，又出现了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特别是在理论界、思想界，一些人打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幌子，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上，则出现了西单的所谓“民主墙”，魏京生之流纠集一伙人公开向党“要民主”、“要自由”、“要人

权”，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静坐绝食，阻塞交通，严重破坏了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交通秩序；上海一个所谓的“民主讨论会”恶毒攻击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有极少数人公开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联系，策划破坏活动。社会上的混乱是思想政治领域混乱的反映。党中央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澄清混乱思想，反对错误思潮，进一步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务虚会。3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小平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性，郑重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澄清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混乱局面，及时制止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们国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八年中，取得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980年下半年，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一度泛起，这集中反映在《苦恋》、《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一批电影、戏剧作品里。《苦恋》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的召集人，也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1981年7月，小平同志严厉地批评了

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说：“象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严肃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专门写了一段话：“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在这里，四项基本原则被作为建国以来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和建设四化的根本保证，第一次正式的、明确的写进了党的决议。毫无疑问，这应当成为全党、全国人民言论、行动的准则。但是，《决议》中的这一重要观点并没有被所有的同志接受，小平同志的告诫也没有使理论界、文艺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改弦更张。时隔不久，理论界、文艺界一些人，包括党内的少数高级干部，又开始大谈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的异化论，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特别是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有些人打着纪念马克思的幌子，公开鼓吹人道主义和

异化论。这引起了小平同志的注意。小平同志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说:“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小平同志再一次强调: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当时,各级党组织认真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思想政治及文化领域里清理了精神污染的种种表现。在清除精神污染时,个别地方出了点小毛病,如把女同志烫发,把杂志封面上的女演员照片,都当作精神污染清理。应该说,这只是在个别地方发生的,而且发现得比较早,纠正得也不算晚。但有少数人,包括我们党内的个别负责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散布“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今后不再提清除精神污染了”,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谣言,说清除精神污染是“谎报军情,上当受骗”。在1984年下半年召开的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些人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谈所谓“创作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演出自由”,甚至搞了“选举自由”。有的同志说,这次会议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受气,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神气,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还要乱。1985年5月、6月,小平同志在两次讲话中,又讲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

不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问题。”在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还有其它几位领导同志，都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思想政治领域、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形势。但是到了1986年下半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开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开始泛滥，不仅限于思想界、文化界，而且扩大到政治领域。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则利用各种机会、各种讲坛，明目张胆地攻击党的领导，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结果导致了学潮的发生。小平同志在去年12月23日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央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指引下，一度广为蔓延的学潮问题得到了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基本上制止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八年，是我们一心一意进行四化建设，迎来国富民康的胜利的八年，也是我们在思想战线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不懈的斗争的八年。邓力群同志在总结这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做了这样的归纳，说逢单的时候，大都是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出来讲话，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逢双的时候，往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泛滥的时候。这不一定十分准确，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却充分反映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小平同志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抓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七十年，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是由于我们国家阶级斗争的状

况决定的。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基本状况和基本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党中央反复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但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只注意了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忽视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个现实，有些人甚至连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给批判了，否定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有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都指出，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立足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尽管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才三十多年，其中还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灾难，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仍然相当清楚地显示出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更是有目共睹的。八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3480亿元增加到19380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02%；国家财政收入由1121亿元增到2220亿元，增长98%；全国城乡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由175元，增加到45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增长86.9%。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正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我们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尤其是要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会以各种形式反

映出来。邓小平同志最近在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中讲到，再过五十年、七十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也许会进入世界前几名，但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中国也只能排到几十位，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也将仍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不如西，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论调也不会绝迹，因此也仍然有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就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都应当牢记中央关于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和基本方针，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能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前进。

二、正确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好。1979年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就有人说：“有了三中全会的精神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收’的”，“三中全会是反左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的”，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立起来。在贯彻中央今年发出的一系列文件，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又有少数同志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实行改革、开放、搞活带来的；还有不少人担心，现在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策可能要变了，改革、开放、搞活可能不搞了，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

放、搞活的方针对立起来。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搞活的辩证关系，赵紫阳同志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赵紫阳讲：“中共中央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方向，没有保证。不讲改革、开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生产力，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走过曲折道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认真地分析了我们的国情，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尽管我们有过失误，有过教训，走过弯路，但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1951年到1980年，工业总产值中国平均每年增长12.5%，英国增长2.3%，美国增长4%，法国增长5%，西德增长5.8%，日本增长11.5%，印度增长5.9%；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来看，1981年至1985年，中国年平均增长10%，美国增长2.5%，英国增长1.7%，法国增长1.1%，日本增长3.6%，印

度增长 4.4 %。由于发展速度快，我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钢产量由建国初期占世界的 26 位上升到第 4 位，煤产量由第 9 位上升到第 2 位，原油由 27 位上升到第 6 位，发电量由 25 位上升到第 5 位，棉花由 4 位上升到第 1 位，粮食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2 位，水泥、棉纱为世界第 1 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同印度的对比。印度同我们的国情相近，人口多，底子薄。印度是 1947 年独立的，当时的经济水平如粮、棉、煤、油等，还略高于我国。印度独立以后，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 30 多年后的状况又如何呢？目前，印度的钢、煤、原油产量不到我国的 $1/4$ ；印度的耕地比我国多 3 千万公顷，但粮食总产量不到我国的 $1/2$ 。就连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对比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情况以后，也承认中国的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所以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只能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放弃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方励之的“全盘西化论”，王若望的“补课论”，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三中全会的路线，也背离了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方针，这正如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的：“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因此，只有牢牢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搞活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还告诉我们：进行四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政治上不安